

# 周末侃 最深刻的慈悲 是懂得

张静雯

2018年的跨年夜，湖南衡南县三塘镇的罗氏夫妇被自己十三岁的儿子锤杀。事发三十多个小时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砍杀者有智力障碍的姐姐在讲到这件事时，只会说几个零碎的词语：钱，游戏。亲戚据此理解，是父母不给儿子钱打游戏，引发了血案。可这条线索如此破碎模糊，现在谁也说不清，少年真正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另一起案件：湖南沅江泗湖山镇，十二岁的少年小吴朝母亲连砍二十刀，致其当场死亡。冲突的起因，现在想起来很是匪夷所思，小吴偷偷抽完了四包烟，妈妈发现后大为光火，举起皮带打了儿子一顿。

这两起惨案只相隔十几天，震惊叠加，寒冷彻骨。

人们显然慌了神，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就没有停过。关于这个问题，刑法专家说得明白，简单降低年龄非但不能遏制犯罪，还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促使未成年人形成反社会人格等新问题，是回避问题、转嫁责任的做法。

但是大家的焦虑是真实的。尤其是沅江弑母案后，当地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置如此年幼的罪犯，一度想让他回到学校上学。家长们群情激奋，最后小吴被送到长沙接受管束教育，衡南县也参照此方案，在现实条件下，这是个不坏的结局。不过，焦虑远没有平息。很多人不能理解，年幼的子女如何下得了手，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杀害父母。小吴即便在警察面前认错，也只轻飘飘吐出一句“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小罗写下过表达孝敬双亲的作文，可举起锤子的那一刻，写在作文纸上的词句似乎只是纯粹的修辞，触动不起心底的一丝波澜。

“不能理解”的事却接连发生，这本身比不知道如何惩罚和矫正“小恶魔”，更让人担忧和警惕。

这两个年幼的杀人凶手，多少都和“留守儿童”沾边。小吴的父母在外打工多年，早年在爷爷奶奶无当的溺爱下生活，妈妈回来后，又开始了粗暴的“严管”，矛盾不断升级。小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可是母亲和姐姐都有智力障碍，父亲忙于生计，很少陪伴，只能惯着孩子，以此“弥补”。

这一切，都没有超出我们对留守儿童的印象，这一切，也完全没有让事情变得可以理解。

对“留守儿童”现象本身，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也从没有真正了解过。我们抽象地知道，他们孤独、缺少陪伴和适当的教育。可是，我们其实完全不能想象，他们是如何长大的。我们只知道，青壮劳动力离开了，但与之息息相关的乡村伦理失落、精神世界的凋敝，我们却难以真正觉察。连接彼此的，只是质朴的同情，或者茫然的恐惧。

很少有人会突破人格极限，酿成弑杀父母的人伦惨案，但孤独的生长环境、贫瘠的精神世界，早已埋下了不祥的种子，结出各种让人费解的恶果。学者张丹丹做过针对留守儿童犯罪的调查，在她走访的男子监狱里，有17%的服刑人员曾经是留守儿童，忍不住让人设想未来十年的犯罪情况，具体情形自然难以确定。

作家袁凌在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里，写过走上犯罪歧途的留守儿童的故事。这篇长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细致地还原了几位主角的成长轨迹，努力接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其中最叫人感慨的，是化名崔凯的小伙子的经历。和其他几个一路迷茫、一路沉沦的孩子不同，崔凯考上了大学，后来又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还攒下了十万元的积蓄。可和同事的一次龃龉，又不经意勾引出他心底的恶毒，他抄起红酒开瓶器，刺瞎了同事的眼睛。

崔凯一度以为，孤独童年留给他的自卑和恐惧已逐渐消失，但现实是，阴影一直在那里，即便他已经很努力地融入正常的生活，早已不是动辄跟人打架的“坏孩子”。

袁凌把崔凯们的生活轨迹，形容为“抛物线式的沉沦”。下坠几乎是宿命，只是你没法知道，他们最后会跌落到哪里。也许你很想拯救他们，可前提是，你得找到轨迹的起点，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命运“抛”出去的。

精神不能互通，公共治理便无从下手。想要真正的改变，需要的是更多像张丹丹、袁凌那样的努力。最深刻的慈悲，是懂得。

三塘镇是“全国小康示范镇”“全省经济强镇”，还是湖南省“诗词之乡”，沅江也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它们不偏僻荒蛮，也不是赤贫。极端案件有其偶然性，难以简单归因，可本该民风淳朴、传统深厚的地方接连发生人伦惨剧，更警醒人们留意社会文化与精神层面的空洞。如果不能找到“抛物线”的原始驱动力，改变滋生“小恶魔”的土壤，谁也不知道，悲剧的魇影，会投到什么地方。

# 应对“人口负增长”要早做准备

本报评论员 樊大威

今日社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2065年缩减到1.996亿的规模。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左右出现。

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人口质量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口流动高度活跃，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丰厚的人口红利。同时，此前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历史性转变，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效缓解，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也不断出现。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

为了应对我国人口发展出现的重大趋势性变化，“全面二孩”于2016年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是我国生育政策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其效果堪称立竿见影。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实施后，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

口持续减少，老年人口加速增长以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我国养老保障负担不断加重，此前大量劳动力释放所激发的发 展能量、人口红利以及消费能力不断衰减甚至消失。随着老龄化、人口低生育率的持续，我国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势必带来更多不利的后果。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会导致社会高度老龄化和人口衰退，进而引发诸多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根据联合国有关报告预测，今后较长时期内世界人口将保持上升趋势，人口总量在2030年将上升到85亿，2050年接近100亿，未来发展中国家人口占比将不断上升。目前，中国老龄化水平及增长速度

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人口负增长影响下，中国不仅可能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人口的世界占比也可能持续下降。一旦形成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态势，将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等外部系统关系的失衡，带来人口安全风险并进一步导致国家根本安全利益遭受严重损失。

应对“人口负增长”必须早做准备。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发展出现重要转折性变化，面对有关重大趋势性变化，必须采取措施积极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努力实现人口自身均衡发展。

为了应对我国人口发展出现的重大趋势性变化，“全面二孩”于2016年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是我国生育政策史上

一次重大的改革，其效果堪称立竿见影。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实施后，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但是喜中有忧的是，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仍低于上一年。究其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全面二孩”政策还不足以扭转当前少子化及人口出生低迷的趋势。

为了应对“人口负增长”，我国生育政策应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未雨绸缪推出必要的强化政策，让生育率恢复至合理水平。面对严峻的人口发展态势，渐进式地调整生育政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时，“全面二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孩”与“二孩”出生数量“剪刀差”现象，也表明单纯调整生育政策不是万能的。

维持适度生育水平是一项重大工作。针对人口变动态势，有关部门应当健全生育服务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破解年轻人“想生不敢生，想要不想要”的难题，使人们能够更好地按意愿生育。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采取支持和鼓励生育的政策，做好超前谋划和政策储备，让生育率稳步回升到相对安全的水平，为经济健康发展、为民族永续发展确立足够的人口安全底线。

王辉耀专栏

## 中国企业“走出去”亟须与第三方合作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经历了积淀学习、初试身手、大步走出去、全方位宽领域参与等四个阶段。最近几年，面对国内外严峻挑战，中国企业需要在掌握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借助历史的经验，探索下一个40年的持续发展之路。

从走出去的角度考量，中国企业要借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实现与第三方深度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中国企业要注重在国内市场的发展，更希望能够在兼顾国内市场的基础上，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实现国际市场的同步发展。

当前的国际环境下，逆全球化之风盛行，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之路，只有加强与第三方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方可实现中国贸易圈的拓展和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维护。

从中国国内经济环境来看，中国企业加强与第三方合作，是中国企业向世界拓展领域、拓宽市场的必由之路。中国企业不能偏安一隅，“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巨大机遇，国家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都在国家层面上推动中国企业与第三方合作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从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环境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特别重视。当前，

“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根据WTO预计，2019年全球贸易量增速将下滑至3.7%。在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下，中国企业更需要加强与第三方合作，并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在全球舞台上接受洗礼，这样才能逐渐成长。

中国企业与第三方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有着优厚的合作条件。与第三方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合作，可以共享前景广阔的人口红利和消费市场，避免恶性竞争。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时间长，经验丰富，中国企业应当向它们学习，并寻求合作。国际机构既有资金的优势，又有丰富的第三方合作经验，中国企业可以从中学习企业全球化的经验，避免重蹈过去的教训。

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企业加强与第三方合作，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变化的客观规律，可以避免恶性竞争。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是企业长期发展和成长的必要阶段，也是中国想要更多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经之路。在具体的合作对象上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中国企业可以加强与第三方国家合作。中国企业与日本、法国签署合作

备忘录，加强了在第三方国家的合作。以中日在东南亚的合作为例，之前中日在东南亚投资工业园建设上“各自为政”，由此产生了相反的竞争效应，中日企业都受到负面影响。后来，中国企业通过与第三方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与日本的合作，把两国的竞争状态转化为合作，不仅扩大了中日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加深了中日两国关系。

中国企业应加强与跨国公司合作。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到全方位宽领域参与经济全球化，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长期深度参与全球化竞争，投资时间长、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相比，仍然显得年轻，中国企业应向它们学习，寻求合作机会，有效规避潜在的风险。

中国企业应加强与国际机构合作。目前，世界很多多边机构支持“一带一路”项目，鼓励与中国企业加强合作。中国企业加强与包括世界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WTO、CPTPP等国际机构合作，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资金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支持，更好规避风险，增加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企业开拓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第三方市场，符合从工业革命后世界发生三次大规模制造业产业转

移的经济规律。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承接外国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企业承接了美国、日本、欧洲、“亚洲四小龙”转移的产业分工，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之路也落脚在实现对第三方市场的开拓上。

当今时代经济发展的特性和中国企业的发展选择，产生了包括国企、民企以及国际组织在内的多层次系统，可以在与第三方市场开拓上形成更大的合力。同时，我国新建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将在国家层面为中国企业与第三方市场开拓提供动力，使其大大增强抵御外在风险的能力，又能保证企业的社会责任落实。

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的基建投资，体现了获得国家层面支持而形成的优势。此外，民企利用市场的引导作用，展现中国企业灵活满足当地需求、适应当地环境的活力。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则为“东道国”提供足够且合理的金融支持。这些特点都使得中国企业的第三方开拓之路有着独特的优势。

改革开放的下一个40年，借助参与“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机遇，中国企业需要抓住与国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第三方合作的机遇，积极利用中国企业的多层次体系，实现中国与第三方主体的多赢局面。

王晓毅专栏

## 宜居农村建设关键要依靠农民

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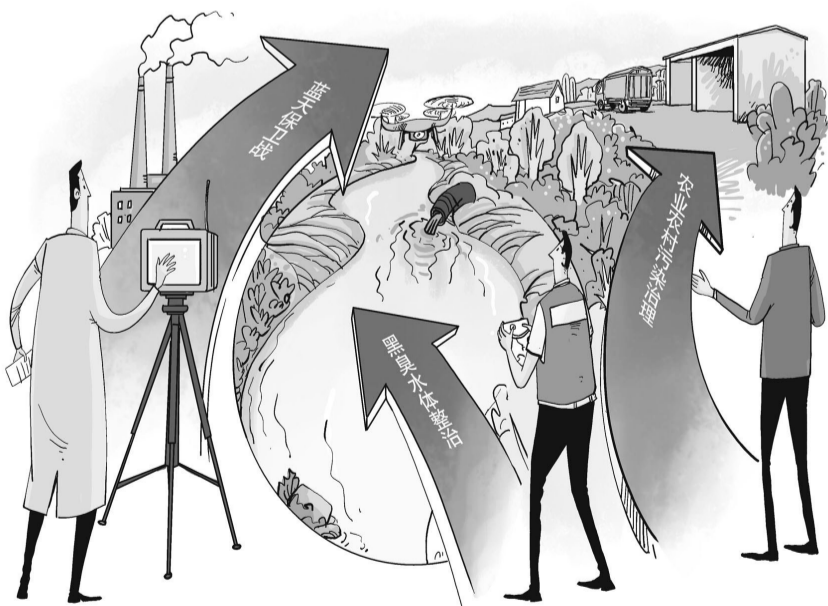
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会确定下一年农村工作的重点。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遵循农村发展规律，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农村建设”作为2019年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党的十九大确定了乡村振兴的战略，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之一。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特别是垃圾、污水和厕所是人居环境的短板，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

垃圾、污水和厕所的治理之所以紧迫，一方面因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对垃圾、污水和厕所治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有可能越来越严重，治理的难度和压力会越来越大。

传统的农村，垃圾、污水和厕所都不构成严重的环境问题。那个时候垃圾很少，而且大多是有机的垃圾，基本无需单独处理。灶灰、菜叶只管扔到猪圈，自然成为肥料，少见的一些玻璃瓶、塑料袋，都是舍不得扔，要反复使用。污水更是很少，特别是在干旱地区，要走很远才能挑驴驮取回来一点水，哪有什么生活污水，甚至洗脸水还要喂牲畜。人畜的排泄物更是宝贝，要用于肥田。

后来，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农村的垃圾、污水和厕所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比如大量工业产品下乡，带来了远远超过农村承受能力的垃圾，特别是塑料垃圾，不管是电商送货的包装，还是扔掉的废弃用具，都有大量塑料难以处



理。农民上楼和集中居住，使厕所和污水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环境。

一方面农村是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农民的生活质量要求在不断提高。过去农民自己养猪，也习惯了猪圈的臭味，甚至一些地方人畜混居，楼下是牲畜的棚圈，楼上就是人住的地方，也相安无事。现在，很多农民特别是受城市影响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能容忍过去的居住环境，有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有了新房子，更希望有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要求的变化共同作用，使得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变得刻不容缓。为此，中央和各级政府增加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投入，将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不过，有了资金投入和政府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目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要特别注意避免走过场和形式主义。

农村环境整治要避免简单地照搬城市的人居环境整治方式。农村居住分散，人口密度较小，这就要求在农村环境整治中要适当的采用分散整治技术。比如许多山区和距离城镇较远的地区，通过远距离修建管网将污水集中处理就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而应当适应当地的条件，采取一些生物技术，进行分散的处理。

厕所的情况也类似。厕所革命的关键是实现粪污的无害化处理，以及作为肥料重新还田，因此要因地制宜，采取适合当地的技术，实现粪污的资源化治理。由于农村基本上没有消纳现代工业垃圾的能力，那么农村垃圾处理就

不仅仅要从末端治理，比如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也可以从前端治理，减少进入乡村的现代工业垃圾。总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能简单照搬城市的治理方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特别防止出现重建轻管的现象。由于设施建设往往有资金保证和各种检查验收，所以在建设阶段，各地都有积极性，但是设施建立以后，需要持续的运行和管理，这就需要资金和人员的保证。一些地方因为缺少管护维修资金，以及没有专门人员进行管护，建成的设施难于持续运行，最后导致许多环境设施不能持续发挥作用。因此在人居环境整治之初，就要考虑到后期的运行问题，包括资金、人力和制度如何筹措和组织。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要让农民觉得，环境整治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管是政府投入环境整治，还是与企业资本合作，最终目的都是使当地村民受益，而要保证当地村民受益，在实施整治之初就要充分征求农民的意见，尊重农民的意愿，满足农民的需求。在整治启动之后，也需要村民的不断参与，建立和完善村规民约，使农村的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目的是为了农民，更要依靠农民，不仅让农民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受益，更要让他们行使权利和承担责任，如此方能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持久改善。

供图/视觉中国



下载北京头条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主编/潘洪其 编辑/姬源 美编/王慧 校对/项战